

朱廷珺 胡静寅 高云虹 安占然 等◎著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 动力、效率与布局



海上丝绸之路



人民出版社

朱廷珺 胡静寅 高云虹 安占然 等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 动力、效率与布局

策划编辑:郑海燕
封面设计:吴燕妮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力、效率与布局/朱廷珺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 - 7 - 01 - 014849 - 6

I . ①西… II . ①朱… III . ①区域经济-产业转移-研究-西南地区
②区域经济-产业转移-研究-西北地区 IV .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581 号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力、效率与布局

XIBU DIQU CHENGJIE CHANYE ZHUANYI DE DONGLI XIAOLÜ YU BUJU

朱廷珺、胡静寅、高云虹、安占然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4849 - 6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动力机制	20
第一节 产业转移的微观动力:异质性企业视角下的空间选择	20
第二节 企业迁移的倾向及城市分布:“双重”异质性视角下的 多城市模型	38
第三节 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引力因素	44
第四节 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制约因素	52
第五节 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推拉模型及动力耦合	55
第二章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与问题	67
第一节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概况	67
第二节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和特点	71
第三节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推拉力分解	85
第四节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93
第三章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效率评价	99
第一节 承接产业转移效率评判指标体系设计	99
第二节 我国东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效率的实证分析	109



第四章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选择	118
第一节 各省(区、市)产业承接力综合评价	119
第二节 各省(区、市)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选择	126
第五章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选择	135
第一节 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评价模型	135
第二节 各省(区、市)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选择	141
第三节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基地建设	155
第六章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161
第一节 研判企业外迁动机与设计产业承接机制	161
第二节 关注产业转移动向与创新承接模式	164
第三节 评估承接能力与增强区位引力	170
第四节 “一带一路”战略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建设	175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	189
第一节 主要结论	189
第二节 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	204
参考文献	208
附 表 西部地区 11 个省区市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能力指数表	215
后 记	229

导 论

产业空间布局与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问题,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甚多。对西部地区而言,承接产业转移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如何科学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提高承接的效率已成为企业、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过四次。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期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正是对这次来自英国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美国后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可以说,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推动了“世界工厂”的第一次变迁,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工业强国。

第二次浪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60年代,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后,率先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将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向正处于经济恢复期的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这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世界工厂”的第二次变迁,联邦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发展成为“世界工厂”。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是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日本成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主要的产业输出国,而亚洲“四小龙”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经过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标准化了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逐步输出,日本在东亚成为引领“雁阵飞翔”的头雁,并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并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的今天。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耗能产业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加工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向中国内地转移,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次国际产业转移通过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的全球范围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实现。由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逐渐成为这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并使得中国在制造业低端加入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产业实现对接和融合,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代工制造平台”。由于加工贸易的大力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然而,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缓慢和中国国内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中国借助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所建立起来的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承接产业转移依然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发达国家几乎都把产业转移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手段,合理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能够很好地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世界经济大幅波



动时期,中国仍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选地,成为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连续二十多年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大 FDI 东道国。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发展要素变化,沿海地区大量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向中国内地以及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国家转移。2010 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转出的产业产值就达 14000 亿元左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趋势。^① 毋庸置疑,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加强。因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产业转移和承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中都被确定为推动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

然而,各地在产业转移和承接中,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经济落后,对国内外投资渴望度较高,一些地区招商引资任务量化和政绩倾向重新抬头,致使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和过剩产能项目,拐弯抹角落户西部。一些地区虽然强调和杜绝了禁止性项目落户,但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耐心,没有深入考察项目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关联、与区域经济中心联系程度和未来发展前景,或者明知是过度开发,也以有利于脱贫致富为由,草率论证,以所谓的“快速通道”仓促上马。类似报道不绝于各种媒体,甚至就发生在身边。毫无疑问,这些非科学发展方式,将会导致西部地区进一步陷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一些资源富裕地区已经陷入“资源诅咒”。对此如果听之任之,不加以深入研究,及时解决,将会事与愿违。

本书所关心的问题是,在发展经济学中把利用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作为外援的主要方式,能够促进东道国(承接地)经济增长,世界大

^① 国家对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如早在 2006 年商务部就启动的“万商西进”工程,2007—2010 年国家开发银行安排 300 亿元信贷资金,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



规模的产业转移似乎反复证明了这种效应的存在。那么,在深入开展西部大开发和调结构、转方式的背景下,承接产业转移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优惠政策攀比,招商容易而落地生根难?究竟是地方政府肩负的发展压力大,还是理论准备不足,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及其发展前景缺乏甄别和判断?西部地区如何把握国内外产业转移出现的新动向?如何弄清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如何评价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效率和利益?如何评估产业承接的基础和条件?如何在国家调结构、转方式和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科学承接产业转移?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夯实产业转移与承接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怎样对接各种发展战略、整合各种优惠政策,做到科学谋划和布局,进而在沿海地区逐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前提下构建国内价值链?等等。

总之,从产业移入地视角考察西部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构建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科学的方法考察西部各省区市承接能力,这对于西部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与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向外转移,以及地区开放战略的设计和政策制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丰富和完善产业转移相关理论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理论演进

产业转移的概念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转移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这是一个包含国际间与地区间投资和贸易活动的综合性的要素与商品流动过程,其在客观上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移动,是国际间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转移地区与承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产业转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

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分工结构的优化。

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产业转移的原因与结果,具体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课题:为什么要进行产业转移?其动机是什么?如何进行产业转移?其机理是怎样的?产业转移的主体、客体、形式是什么?有无模式?产业转移的产业流向和地区流向有什么规律?其条件是什么?产业转移的效应有哪些?对移出地和承接地有何影响?从已有研究文献看,早期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转移的机制进行了探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及经营理论的联系日趋紧密,向微观领域发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更加注重产业转移动因的微观基础。

(一) 产业转移的动因

从国家和区域层面看,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技术创新等。赤松要(Akamatsu, 1935)提出的雁行模式可看作是较早的产业转移理论,该模式根据日本棉纺织业发展的实践总结而来,说明了幼稚产业通过产业转移引进技术实现快速发展的必要性。^①用“产品生命周期”统领比较优势变化的美国学者雷蒙德·维农(Raymond Vernon, 1966)运用动态分析方法,从产品自身演化的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动因,并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来解释产业国际转移现象。该理论认为,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动会导致产品生产地点的变动,从而实现产业转移。他认为,一国的产业转移,实际上是产品的生产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国家间转移。日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 1978)通过观察日本产业转移的现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他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出发,采用动态方法分析了日本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及其变化,回答了这些原因和变化对日本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产

^① Akamatsu K.,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62, Vol.14.



业转移是边际产业出于回避产业比较劣势,显现其潜在比较优势而实施的空间转移。

这些理论对我国学者的影响较大。早期的梯度转移论(夏禹农、冯文浚,1982;何钟秀,1983;周起业等,1989)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主导部门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区域主导部门趋于衰退并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78)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他指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过低(几乎为零)而工业增长速度过高引致非熟练劳动力短缺的缘故。尽管刘易斯没有回答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条件,但他建立在H-O要素禀赋模型基础上的观点,符合当时的现实,至今还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视角进一步扩大。日本学者关满博(Seki Mitsuhiro,1997)以各国技术结构的差异性为切入点,认为技术差异导致了产业分工,产业分工又导致了产业转移。威尔斯(L.T.Wells,1977)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Sanjayalall,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维尔(John A.Cantwell)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1990)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则从局部创新的角度探讨了区际产业转移。一些学者还把产业转移与国家政策行为联系起来,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贸易保护的需要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影响了产业转移的主体、客体以及产业流向和地区流向。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isch,1990)认为,发展中国家迫于发展的压力而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源。因为正是进口替代战略为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打开了大门。一些实证研究文献表明,政府政策是影响中小企业区位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在企业迁移中所起的作用,包括基础设施、设定特区、补贴和退税

等。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的选择,企业更愿意以距离城市更远的成本定位,在更接近高速公路的区域选址(Adelheid Holl,2001)。

以上论点大多是从比较宏观的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分析的。事实上,离开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企业,很难将产业转移的动机分析透彻到位。20世纪60—80年代,众多学者开始从企业的空间扩张这一微观角度研究产业转移的动因。史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创立的垄断优势化是从实证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入手提出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他认为,垄断与优势结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而国际直接投资便是企业产业转移的开始。约翰·邓宁(John Harry Dunning,1977)进一步用O-L-I模型来说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较好地解释了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转变。他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认为,企业将其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与承接地的生产要素结合运用比在本国运用更有利时,便产生了产业的国际转移。以西蒙(Simon,1959)、普莱德(Pred,1967)和西门纳尔(Schmenner,1982)等为代表提出的“企业迁移行为理论”认为,企业迁移的动力是区位推力和吸力的合力。其中,推力主要有企业内因和外部原因。内因主要与企业扩张有关,即当前区位限制了企业扩张,或者当前区位的代表性有限(随着企业的规模及时间的改变,该区位的使用频率也会变化)时,企业就有了迁移的要求;外部原因主要包括到达企业所在地较困难、远离市场、现有建筑物损坏、政策环境不好、劳动力供给不充足、房屋购买和租用成本过高,这些因素都会成为企业迁出的动力。与推力相反,有足够的空间,接近分销商、供应商和顾客,劳动力供应充足,生产成本低,并且房地产价格合适、适宜居住等,是吸引企业迁入的重要因素。此外,经济地理学中的企业成长空间扩张论,即沃茨(Watts,1980)的市场区扩大模式、泰勒(Taylor,1975)的组织变形及区域演化模式、哈坎逊(Hakanson,1979)



的全球扩张模式、迪肯(Dicken, 1986, 1990)的全球转移模式,以及史密斯(D.M.Smith, 1971)的企业赢利空间界限论等都是微观层面分析产业转移动因的经典理论。

但是,上述理论大都将市场假定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规模经济,这对于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学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缺乏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区位模型,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Krugman, 1991)。为此,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假设的前提下,克鲁格曼、藤田(Krugman & Fujita, 1999)及维森(Wissen, 2005)等将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化,并将企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构建了一系列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回答了企业空间转移的动因及路径选择。

国内研究的代表人物梁琦(2004)以空间经济学为基础,用产业区位的周期性变化说明了产业的区域转移现象;卢根鑫(1994)、陈建军(2002)、陈刚和陈红儿(2001)等学者从产业成长和演化的角度对产业空间转移进行了解释;石奇(2004)则用集成经济的原理解释了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认为产业转移是企业在技术手段之外通过对市场的重组和集成实现经济性的结果。

张可云(2001)认为,区际产业转移是区际产品和要素流动之外的另一种区际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区际产业转移既是对区际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的一种替代,又会促进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刘世锦(2003)认为,由于产业聚集等因素的影响,区际产业转移未必会发生。如产业聚集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这一条件一旦形成并趋于成熟后,再转向其他地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人们提出中国是否还有劳动力比较优势、依靠什么吸引国际产业转

移等问题。对此,蔡昉、王德文、曲玥(2009)提出,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产业而言,区位优势必须要与其产业的特殊性相匹配才符合其区位要素要求,才能形成真正的优势。也就是说,与产业特征相匹配的区位优势在企业的区位决策中显得更加重要,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要具备逐渐改善的投资环境,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

然而,上述国内外模型大多未考虑企业异质性这一现实,而将企业假定为外生同质性。

学术界对于企业的异质性引致企业国际转移的探讨,多有统一的认识,但对于企业的异质性的界定却存在许多争议。主流文献多将生产率、产品质量和工人技能的差异视为异质性的源泉(Yeaple, 2005),而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文献则扩大了企业异质性的范围。

一是生产率的异质性。鲍德温和奥库博(Baldwin & Okubo, 2005)将马汀和罗杰斯(Martin & Rogers, 1995)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引入麦莱兹(Melitz, 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假定企业是异质的且是可以空间移动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即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两个部门(即制造业M和农业A)、两种要素(即劳动L和资本K),并认为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异质的,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同质的,可以自由流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分析企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模型,并分别从不同企业的生产选择和市场进入方式进行模型扩展和论证。结果表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定并非符合实际,由于企业异质性和滩头成本(Beachhead Costs)的存在,改变了企业集聚过程中的性质以及北方大国(中心)和南方小国(外围)的福利分配。同时,冰山贸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的逐渐降低也导致了生产率高的企业逐渐从小国向大国转移以改善自身的福利水平。汉森和尼尔森(Hansen & Nielsen, 2007)构建的双寡头贸易模型同样支持了上述结论。由此可见,企业边际生产成本度量的生产率的异质性驱动了企业



的国际转移。

二是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对于这类问题的探讨最早是从行业规模的异质性视角切入的。坦车恩(Tsechien, 2007)构建了规模不对称行业的垄断竞争模型,分析企业转移与行业规模的相互关系。研究认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会选择规模较大的行业,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则会选择小行业。由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和规模差异的存在,迫使大行业中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向小行业转移,而小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则会选择向大行业转移。鲍德温和奥库博(2006)深化了上述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Effect)的存在和企业规模(Firm-size)的差异引致了企业的国际转移,这种转移可以是以FDI的形式,也可然是以产品或服务的外包,或者是工序贸易(Trading Tasks)的形式。在此背景下,小国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自发向大国转移,进一步巩固了大国的生产率收益,扭曲或损害了小国的生产率收益,使大国在贸易中获利较多,并得到企业转移所带来的额外红利(Extra Dividend),而小国则相对获利较少。

三是贸易政策与企业分布的异质性。相关文献将贸易政策与企业分布的差异纳入异质性定义,是学者们将新经济地理学引入新新贸易理论用以解释异质企业国际转移的尝试性探索。鲍德温和奥库博(2006)将研究视线转向新经济地理学,在引入企业异质性假定后,对新经济地理学许多结论予以修正。通过对模型的分析表明,对异质企业的重新定位包含两种效应: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和分类效应(Sorting Effect)。前者表明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方法过高估计了产业的集聚效应,后者则表明有利的区域贸易政策会诱导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转移到核心地区(the Core),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则转移到外围地区(the Periphery)。此外,鲍德温和奥库博(2009)在马汀和罗杰斯(1995)与麦莱兹(Melitz, 2003)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税收政策,构建多因素的异质企业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税制结构和税收变化对企业转移

的影响。研究认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对税收政策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其中大企业更有可能逃避大国的高税收，转移到税收较低的国家。

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微观机理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张建虎、李长英(2010)基于产品多样性视角分析了企业集聚与企业的区位选择。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使得企业选址和国际化转移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洪联英、罗能生(2007)基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假定，在回顾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整合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径及其策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对企业国际化路径的选择提出相关建议。李春顶(2009)则拓展了新新贸易理论模型，选取了我国36个行业1997—2006年的数据证实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决定了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结论。钱学峰(2010)发现产业集聚可能是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行空间选择的结果，从而将微观企业的集聚与转移行和生产率水平联系起来，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企业转移的动因及其内在机理。延续这一思路，刘海洋、孔祥贞、汤二子(2012)利用新近发展的新新经济地理框架，着重分析了产业集聚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效率的差异使得高效率企业与低效率企业发生分离，从而出现企业转移活动，并引致区域产业结构的变迁。上述研究，不仅为企业转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也为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提供了崭新的微观视角。

(二) 产业转移的模式与路径

产业转移的模式是由产业转移的主体、客体和形式变化所形成的特定形式。一般认为，产业转移往往发生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或区域间贸易、区域间投资活动之后，只有在这两种活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产业转移才可能发生。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有时很难将产业转移和国际间或地区间的投资和贸易及技术转移活动截然区分开来。产业国际转移，早期采取产品输出型，因为贸易实质上是生产的替代。在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资本积累和资本输出时期,大多采取的是资本输出型。在转移模式上,既可以采取企业整体迁移方式,也可以采取 FDI,或者工序贸易、外包方式。^①

赤松要(1935)在其《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为说明当时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他认为,先行国(地区)与后起国(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梯度的产业传递和吸纳的动态过程,由此形成了先行国(地区)和后起国(地区)一定时期的产业循环和连锁型变化机制,促进了后起国(地区)产业结构向着更高层次转换,反映了产业转移由消费资料产业向生产资料产业、轻工业向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工业的演化,同时说明这种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实际上既涉及企业的国际转移,也涉及了生产工序的国际转移,如今被新新贸易理论称之为“工序贸易”。谭(Z.A.Tan,2002)在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从产品系列的角度来解释产业内的国际转移现象,进一步使之动态化和系统化。他将产品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并将对应的市场结构分为“直接出口”、“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当地生产”三种。对于高档产品而言,对应的市场结构以直接出口为主,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为辅;中档产品则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与当地生产为主,辅之以直接出口;低档产品则以当地生产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产品不断充实到高档产品系列中。与此同时,高、中档产品系列中的一部分降级并充实到中、低档产品系列中去。与上述框架相对应,就国际产业转移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者将高档产品的生产主要放在本国进行,辅之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国外组装;就中档产品而言,产品在国外组装的同时生产也逐步向国外转移;低档产品的生产则完全转移至国外进行。从

^① 安占然:《产业转移的动因与模式:研究进展与前瞻》,《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